

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及启示

阎学通

荀子(约公元前 313—238)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中国古代思想史学界对他的思想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绝大多数研究是从治国的内政角度出发,只有极少数学者从国际政治角度研读荀子的思想。荀子有关国际政治的论述散见于他的各类文章之中,论述较多的三篇是《任制》、《任霸》和《任论》。虽然荀子有关国际政治的思想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但他在两千多年前形成的思想中却有很多可以用来解释当今的国际政治现象。这意味着,他的某些思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本文将在讨论荀子的分析方法和国际政治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它对中国崛起战略的启示。

* 作者从匿名评审专家的评点中得到很大帮助,在此向匿名评审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见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3年版,第 315—330页。

本文仅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角度分析荀子的国际政治思想,无意也无力介入史学和文献学有关荀子著述校译的学术讨论。鉴于史学界普遍以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为研究基础,故本文所引用的荀子言论均以沈啸寰和王星贤点校的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为准。本文对荀子引言的解释参阅了杨柳桥著的《荀子诂译》、王天海校释的《荀子校释》、蒋南华和杨寒清注译的《荀子全译》、高长山译注的《荀子》。

荀子的思想产生于公元前的战国时期。那时的诸侯国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人民、领土和政府三个构成要素方面相同,但缺少主权这一要素。因此,“国家间”(inter-state)和“国际”(international)有细微的差别。但是“国际”一词现已被普遍用来描述国家间的概念,“国家间”一词已很少使用,因为本文采用“国际”一词,而不做“国际”和“国家间”的区分。

《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总第9期),第115—144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对国际政治的分析方法

(一) 个体主义分析和个人层次分析

国际行为体和国际体系是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两个重要分析变量。以行为体变化为依据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被称为个体主义分析法,以国际体系变化来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的被称为整体主义分析法。荀子虽然也讨论过国际规范(礼)和五服体系对于防止国际冲突的作用,但是,基于世界大一统的思想,他主要是从大国政策的角度讨论如何实现国际秩序的稳定。在荀子看来,大国的性质是国际体系安定与否的原因,国际体系并不会改变大国的行为。他从分析国家强大、衰败和灭亡的三种变化条件入手,总结了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在他的分析中,作为因变量的国际秩序有两个变量值,即安宁(“治”)和混乱(“乱”),作为自变量的国家性质有三个变量值,即王、霸和强。在荀子的文章中,作为动词,“王”是指领导世界,“霸”是主导世界部分地区,“强”是指实力超过其他国家;作为名词,“王”、“霸”、“强”三个词则是指从事上述三种不同行为的国家或君主。他将国家性质、君主类型和政策性质三者视为同一个事物的三种表现形式,认为这三者是一致的。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取决于世界大国的性质。如果世界大国是王权国家,国际秩序就安定;是强权国家,国际秩序则混乱;是霸权国家,则与其结盟的同盟国之间就处于安定状态,但霸权国之间或非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仍是混乱的。(参见表-1)

国际政治理论常用的三个分析层次是体系层次、组织层次和个人层次。荀子的分析属于个人层次。在他的分析中,国家性质是一个中介变量,君主才是最根本的自变量。他认为,国家是君主用来治理社会的工具。如果君主的道德和信仰不同,运用国家这一工具的原则和策略也就不同,于是国家的性质也不同。世界大国君主的道义差别导致其国家性质的差别,从而决定了国际秩序是安定还是混乱。他说:“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执也。得道

荀子文中的“霸”与英文中的“hegemony”相似,是个中性词,没有贬义。本文中的“霸权”一词也是中性词,即没有对外侵略扩张和欺凌小国的含义。

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这是说，国家是世上最有用的工具。君主是世上最有权力的。君主正确运用国家这个工具，就有安宁和荣誉，积累美好的源泉。错误使用国家这个工具，则有大危险和大累赘，还不如他们不掌有国家好。

表-1 大国性质与国际秩序

大国 国际 性质 秩序	王权	霸权	强权
安定			
混乱			

荀子的个人分析层面并不局限于君主一人，而是同时强调大臣的作用。在他的分析中，大臣和国家性质是同等重要的中介变量。大臣是介于君主和国家性质间的中介变量（参见图-1）。他认为，君主的核心功能不是亲自治理国家，而是选择治理国家的大臣。他说：“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篡之而亡。”这是说，掌握国家的人不可独自治理，国家兴衰荣辱的关键在于选什么人辅佐。君主和辅佐者都有才能，可称王天下。自己无才，因恐惧而寻求有才能大臣的



图-1 决策者与国际秩序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 202页。

同上书，第 209页。

人,可使国家强大。自己无才,不知道害怕也不寻求人才,任用身边阿谀奉承的人,这样的人会危及国家,严重到一定程度国家就会灭亡。荀子认为,将君主与大臣这两个变量相比,君主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因为大臣这一中介变量是随着君主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他认为贤臣并不稀缺,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被君主所任用。大臣们是各种各样的,关键是君主想重用什么样的人。他说:“故成王之于周公也,无所往而不听,知所贵也。桓公之于管仲也,国事无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吴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于亡,倍道失贤也。故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这是说,周成王听从周公的,因为他知道周公的贵重;齐桓公在国事上都听管仲的,是因为他知道听管仲的政策肯定有利。吴国有伍子胥,但他不被任用,于是吴国灭亡了,这是违背正道失去贤人的后果。因此,尊崇圣人的可成帝业,珍惜贤人的可成霸业,尊敬贤人的可以生存下来,怠慢贤人的将灭亡。

(二) 观念决定论和内因决定论

国际政治理论可分为物质决定论、观念决定论和两者共同决定论三类。现实主义理论一般是物质决定论,将国家硬实力视为决定性因素;建构主义理论一般是观念决定论,将人的观念视为决定性因素;制度主义理论则采取了折中的立场,认为物质力量与制度规范两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荀子并不否认物质实力的重要性,但他的分析方法与建构主义理论一样,将观念视为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他与建构主义的区别是,他的自变量是君主和大臣的个人观念,而建构主义强调的自变量是社会集体观念。在讨论行为规范时,荀子使用的“王”、“霸”、“强”三个概念与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的“康德文化”、“洛克文化”、“霍布斯文化”有部分的相似性。荀子说:“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其意是帝王争取人才,霸主争取友邻,强权君主争夺土地。他认为,争取人才靠道义,争取盟友靠诚信,争夺土地靠实力。温特认为康德文化、洛克文化和霍布斯文化是三种性质不同的文化结构,即三种不同的国际规范,三者的基

荀子·君子篇第二十四》,第452—453页。

荀子·王制篇第九》,第154页。

础分别是合法性、代价和实力。比较两种概念可以看到,“王”和“强”分别与康德文化和霍布斯文化很相似,但“霸”与洛克文化有较大差别。

荀子不是将君主和大臣的能力而是将他们的观念视为国家地位的变化原因。他认为,君主所持有的不同观念使他们选择具有不同政治原则的大臣,政治原则不同的大臣们实行不同的政策治理国家,不同的政策获得不同结果,于是国家地位就发生变化。荀子说:“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这是说,尊崇称王法则的君主选择实行称王政策的人治理国家,就会称王天下。尊崇称霸法则的君主选择实施称霸于诸侯政策的人治理国家,可以成为霸主。然而,尊崇亡国法则的君主让那些政策导致国家灭亡的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

由于荀子把君主和大臣的观念视为国家行为的原动力,因此他的分析方法是内因决定论。他说:“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万乘之国者,威强之所以立也,名声之所以美也,敌人之所以屈也,国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与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灭亡,制与在我,亡乎人。”这是说,具备当帝王条件的可当帝王,具备当霸主条件的可当霸主,具备生存条件的可生存,具备灭亡条件的则灭亡。治理一个大国,其国威强大,声誉良好,敌人屈服,国家安全,其关键在于君主自己而不在于别国。领导世界,称霸诸侯,保障国家安全地位,以及招致危险和灭亡的关键在于自己而不是别国。

(三) 严格分析和比较分析

一切国际政治现象都是多因素结合的结果,依据分析时选取自变量的多少,分析方法可分为严格分析和全面分析两种。全面分析法是把多个变量并列起来,同时解释因变量的变化而不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全面分析法不同,严格分析是指用单一变量解释因果关系逻辑链条上的变化,因此要分析每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沃尔兹(Kenneth N. Waltz)以大国实力结构为自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50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第207页。

《荀子·王制篇第九》,第171页。

变量解释国际体系战争的有无,就属于严格分析法。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以权力、利益、文化、法律、道德、外交策略等多个自变量来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就属于全面分析。

荀子的分析方法属于严格分析法,而非全面分析法。他以君主的观念为最根本的自变量来解释负责制定国家政策大臣们的性质,以大臣的性质解释国家性质,再以国家性质解释国际秩序安定与否(参见图-1)。如果将他的分析逻辑进一步细化,可以得到图-2。在大臣与国家性质之间可加入政策取向这一中介变量,在国家性质与国际秩序之间可以加入国家实力和对外关系两个中介变量。在荀子思想中,不同层次的变量关系有明显的逻辑关系,而且这些逻辑关系能够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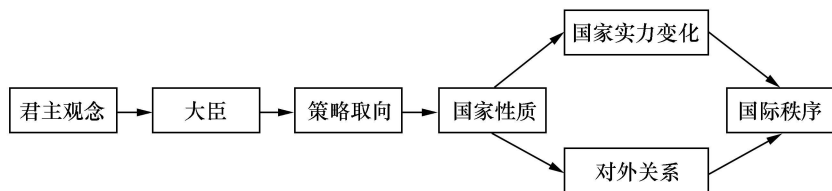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层次变量的关系

比较分析法是与个案分析法相对应的一种分析方法。个案分析法是指用一个案例从正面论证观点,而比较分析法则用正反两方面的例子进行比较的方法论证观点。荀子经常用正反两面的例子论证他的观点,因此属于比较分析法。他最经常使用的正面案例是商汤、周公和文王,反面的案例是夏桀和商纣。例如,在论证世界领导权不是夺来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这一观点时,荀子说:“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这是说,商汤和周武王不是夺取天下,而是因他们履行道义,为世人做好事,消除危害,天下自动归附于他们。夏桀和商纣不是丢了天下,而是因为他们与夏禹和商汤的道德相反,破坏规范和道义,行为如同禽兽一般,坏事做尽,罪恶深重,天下自己走了。

《荀子·正论篇十八》,第324页。

天下归顺称为“王”，天下走了称为“亡”。

荀子有关国际政治的认识虽然有较强的逻辑性，但按现代科学标准，其分析方法还算不上是科学方法，论证举例的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实证方法。他所选用的事例中很多都是历史传说，事件的时间、背景和基本过程都没有，事实来源也无法查证。此外，他选用案例时缺少必要的变量控制，属于归纳法中的简单枚举法。简单枚举法是人们最经常使用的论证方法，但这种方法的科学性较差，案例的实证性和说服力都不太强。

二、对国家实力的认识

（一）国家作为行为体和工具的双重性

在荀子的著作中，“国”的概念有时指政治单位，有时指执政工具。这一点与现代政治学对于国家的认识基本一致。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国家是国际行为体之一，但从国内政治角度来讲，国家则是统治民众的工具。

根据实力的大小，荀子将国家分为天子之国和诸侯国。他说：“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谓之君。”这是说，古代天子之国有上千的官员，诸侯国有上百的官员。靠着上千大臣的帮助，天子的政令才被中原的诸侯国所接受，因而称为帝王。而靠上百的大臣帮助，其政令能实行于一国境内，其国家虽不安定但不至于废替和灭亡，因而称为国君。上面这段话里的“国”，显然是指政治单位。不过天子之国是王权国家，其规模和实力都是诸侯国的数倍，因此其权力大于诸侯国。

从功能的角度出发，荀子认为国家是个政治工具。他说：“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其意思是说，国家是世上最大的工具和重要的责任，不能不妥善地选择人来掌握，不能使之出错，错误的人掌握了国家就危险了。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6 页。

《荀子·正论篇十八》，第 323 页。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第 207 页。

(二) 政治实力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关系

荀子对政治实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作用以及三者关系的认识与现代观念有较大区别。现代人普遍认为经济实力是政治实力的基础,荀子的看法则完全相反。

在荀子看来,政治实力是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发挥作用的基础。他认为没有政治实力作基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再大也没有意义。荀子的这种思想与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克莱因(Ray Cline)发明的综合国力方程在逻辑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根据克莱因方程 $P_p = (C + E + M) \times (S + W)$,综合国力是软硬两类实力的乘积,即当软实力为零时,综合国力为零,硬实力不发挥作用。荀子讲:“文王载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纣舍之,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他的意思是,文王遵循圣王的道义,以方圆仅百里的地方统一了天下。桀和纣两人放弃圣王的道义,虽然有世上最大的权势却不能像个普通百姓那样寿终正寝。所以,善于用圣王道义,方圆百里的小国也能保证独立,而不善于用圣王道义,有楚国那样方圆六千里的地域也会被敌人奴役。1991年苏联解体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荀子的这一观点。苏联解体时,其军事实力与美国相当,经济实力世界第三,但当苏联政府失去内外政治动员能力时,其硬实力连维持国家生存的作用都发挥不了。

荀子还认为,政治实力是硬实力增长的基础。荀子是道义决定论者,认为一国强胜与衰败的核心是国家政策的正确与否。政策正确,国力就能增长;反之亦然。他说:“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不崇尚规则、不爱民、不履行承诺、奖赏不丰厚、将帅无能,

P_p —perceived power C—critical mass E—economic capability M—military capability, S—strategic purpose, W—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

荀子·仲尼篇第七》,第109页。

荀子·富国篇第十》,第194—195页。

其中任何一项都能使军事力量衰弱。君主好大喜功、贪图财富,官员众多,工商业者众多,财政开支没有节制,其一即可使国家贫困。在荀子看来,大禹时十年水灾,汤王时七年旱灾,而人们却没有吃不饱的;十年灾害过后,每年丰收且有余粮。这不是其他原因,而是禹和汤明白什么是基础,什么是表象。美国的三权分立、日本明治维新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曾使这些国家的国力快速增长,这些近现代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荀子将政治实力视为硬实力增长基础的思想。

荀子认为国家的政治体制是经济能否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与经济水平是政治制度基础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说:“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篚,实府库。”他的意思是,尊崇礼仪的君主可成为帝王,善于处理政务的可使国家强大,取得民心的可使国家安宁,聚敛财富的则使国家灭亡。所以帝王会使百姓富裕,霸主会使政府官员富贵,在勉强生存的国家里只有高级官员才富贵,趋于灭亡的国家只有领导人自己富贵,国库充盈。1978年以来,我国以改革开放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一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理解荀子关于政治体制是经济实力增长基础的观点。

荀子还认为,对外政治原则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在他看来,国家安全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大小,还取决于政治上能否与他国保持合理的关系。他说:“将修小大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这句话的意思是,要遵守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的道义,慎重对待,礼节完善,馈赠大玉器等丰厚礼品,派出文雅聪明的使节。对方只要懂得人情,怎么会不满意呢?这样,原先心存不满的国家也就不来攻打了。为名、为利和心存不满的国家都不来攻打,国家就会安如磐石,就能像旗宿星和翼宿星一

荀子处于农业社会,因此认为农业是国家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工商业则是辅助性的。这如同在工业社会工业被视为国家经济最为主要的部分,服务业则被看做是辅助性的,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被视为国家经济最为主要的部分而农牧业被视为是辅助性的。

《荀子·王制篇第九》,第153—154页。

《荀子·富国篇第十》,第198页。

样永存。20世纪60年代,我国采取反对美苏两霸的对外政策,21世纪初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奉行不同政策原则的结果是,60年代中国南面与美国在越南作战,北面是苏联的大兵压境;而21世纪初我国与美俄(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继承体)保持了正常的大国关系,其安全环境远好于60年代。这种历史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荀子将外交政治原则视为国家安全基础的思想。

荀子认为,政治实力在外交斗争中的作用比经济实力更大。他认为,用财富贿赂他国的策略是无效的,而最为有效的方法是以道义强国。他说:“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这段话是说,用财宝向强国示好,财富用尽也缔结不了邦交;用誓盟的方法约束,强国签了条约不日就会违反;以割让土地来贿赂,强国占了土地后其欲望仍得不到满足。给的好处越多,强国越想侵略,必然是占有别国全部资产和国家才罢休。因此,圣明的君主不会这样做。他必然是以尊崇礼仪来整顿政府,以法律整肃官员,以平和政策管理百姓。然后就能做到政府统一步调,官员齐心协力,百姓心悦诚服。这样,周边的人争相亲近,远处的人愿来投奔,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于是,名声如日中天,威力足以惩戒,举手指挥,强国无敢不从,这如同力大无穷的乌获与身材矮小的焦侥两人搏斗一样。

为了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日本政府决定2005年投入160亿美元从发展中国家那里购买选票,其结果未能如愿。1971年美国反对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席位,当时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远远大于中国,但在非洲友好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成功地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两个历史事件有助于我们理解荀子提出的在外交中政治实力比经济实力作用更大的思想。

荀子·富国篇第十》,第199—201页。

陆洋:《非洲拿什么拯救自己》,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7/22/content_3252643

htm。

(三) 实力不均衡发展原理

荀子认为,他国的治国失败是本国强大的重要原因。他说:“如是,彼日积敝,我日积完;彼日积贫,我日积富;彼日积劳,我日积佚。君臣上下之间者,彼将厉厉焉日日相离疾也,我今将顿顿焉日日相亲爱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国为是者霸。”这是说,别国一天天地积累敝病、贫穷、劳苦,我国一天天地积累完善、富贵、安逸。在君臣之间,别国一天天离心离德、相互仇恨,我国君臣则相互亲爱、精诚团结。以我国的有利应对别国的弊端,能使自己的国家如此的人可以建立霸业。荀子的这种认识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相对实力概念十分相似。由于本国的实力地位是相对于他国实力而言的,因此一国实力地位的根本是拉大与别国的实力差距,而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是他国的衰败。如果所有国家的实力增长是等速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实力地位不会变化的。

荀子还说道:“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失丧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他的意思是,其他国家都动荡不安,而只有本国太平安定,这样才能在其他国家都灭亡时,我国接收治理它们。所以,仁义的君主不仅用国家这一工具保住自己的生存,而且要兼并他国。荀子不反对兼并,但认为不同性质的兼并其结果不同。有道义的兼并能增强实力,无道义的兼并则会削弱实力。他说:“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也就是说,以道德为基础的兼并可以获得世界领导地位,以实力征服对方的兼并则会削弱本国,以财富兼并他国则使本国贫穷。

在观念决定论的支配下,荀子将国家间实力不均衡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的观念不同。他说:“人臣之论:有忮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忮臣者亡。”这是说,大臣的类别可分为谄媚的、擅权的、建功的、圣贤的等等。因此,能用圣贤者可成为世界领导者,能用建功者可使国家强大,而用擅权者将面临危险,用谄媚者则国家

《荀子·王制篇第九》,第173—174页。

《荀子·富国篇第十》,第199页。

《荀子·议兵篇十六》,第290页。

《荀子·臣道篇第十三》,第247—248页。

灭亡。根据这段论述可以得出君主与国家实力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是, 国家实力地位变化源于国家的政策, 政策出自治理国家的大臣, 而选用什么样的大理由领导人的观念决定 (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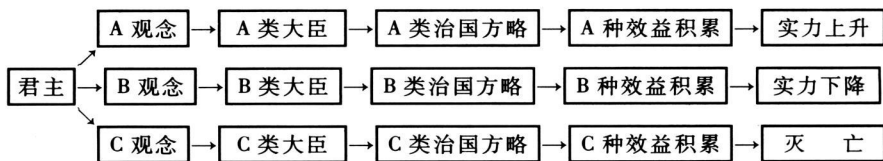


图-3 实力不均衡发展原理

荀子说:“为人主者,莫不欲强而恶弱,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恶,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领导人都想国家强大、安定和荣耀,厌恶衰弱、危险和耻辱,禹和桀也是这样。要实现三个愿望,避免三个厌恶,什么方法最便利呢?答案是慎重地选择丞相,没有比这更简便的方法了。在总结历史上国家消亡的教训时,荀子说:“古有万国,今有数十焉,是无它故,莫不失之是也。”这是说,古代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剩下十来个了。灭亡原因不是别的,都是用人失误。

由于荀子认为任用何种官员直接关系到国家实力的增长与衰落,因此他将选用人才视为强国战略的核心。他说:“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纂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这是说,要统一天下,制约秦和楚这样的大国,最好的方法是任用聪明有道义的人。他们运用知识很容易,做事不费力,而且功名很大,这些人容易相处而且很乐观。因此,圣明的君主把他们视为珍宝,而愚蠢的人则觉得难以与他们相处。荀子还提出了不分贵贱任人唯贤的人才原则。他说:“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这是说,领导人为什么不广招人才呢?不照顾亲属,不分出

《荀子·君道篇第十二》,第 240页。
同上,第 242页。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第 216页。
同上,第 218页。

身贵贱,只要真正有才能就加以任用。这样,其下属的大臣就会看轻职位,并将其让给贤人,听从他们的指挥。如果这样做,舜、禹式的贤君还能再现,王业还能重建,功业可达到统一天下。与舜和禹齐名,事情如此美好,还有比这更快乐的吗?

荀子对于国力变化的认识是典型的明君贤相思想。这种认识使他得出政治人才是国家强大根本的结论。在这一点上,他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们的认识基本一致,只看到了制度是人制定的,而未想到民主选举制度本身具有淘汰不合格决策者的纠偏功能。在荀子的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制度创新是国家实力地位变化的根本因素。由于荀子把统一世界作为君主的最高政治目标,因此他并非无条件地反对国家兼并行为。他以兼并性质为标准判断兼并行为正义与否,这种观念显然不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规范。他可能还夸大了政治实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一个小国即使坚持道义的外交政策,但仍难免大国对其产生侵略野心。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三、对国际权力的认识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权力的讨论有三个方面,一是权力关系,即国家间的关系是合作、竞争还是对抗;二是权力大小,即国家拥有的国际权力是主导、辅助还是参与的性质差别;三是权力内容,即国家拥有的权力属于政治、经济、安全哪个方面。然而,荀子有关国际权力的论述则主要集中于权力性质的讨论,这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研究较少的问题。

(一)“天下”和“有天下”的定义

“天下”概念是荀子分析国际权力性质的基础。明确他的“天下”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关于王、霸、强三种国际权力性质的思想。

他认为,“天下”是世界,“有天下”就是拥有世界领导权,这种权力是民众和各诸侯国自愿接受圣人领导的结果,而不是君主以暴力夺取的职位。他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对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天下者,至

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这是说,天下是最重大的事,不是最强的人无法担当此任;天下是最广大的,不是最文明的人不能建立等级;天下是人最多的,不是最英明的人无法使人们和平。这三项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因此不是圣人领导不了世界……天下是最大的,不是圣人就拥有不了天下。他反驳桀和纣拥有世界领导权的说法,他说:“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他在此否定汤王和武王篡夺了桀和纣的世界领导权的世俗说法。他认为,说桀和纣曾有领导世界的职位,这是对的;但说他们拥有世界领导权,则是错的;把世界领导权说成是桀和纣的,也是错的。

荀子认为,世界领导的职位与世界领导权是两回事。他说:“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执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内则百姓疾之,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这是说,圣王的儿子是圣王拥有世界领导权之后的人,他继承了世界领导的职位,代表了领导世界的家庭。但是,如果他没有才能且行为不轨,国内百姓就会憎恨他,国外的诸侯国就要叛离。近处是国内不统一,远处是诸侯国不服从,命令在国内行不通,甚至遭到诸侯国们的进攻。这样,虽然还未失去领导职位,但我说世界领导权已经丧失了。2002—2006年的阿富汗政府,有统治阿富汗国家的职位,但实际上其权力的实施范围仅限于首都喀布尔。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关于世界领导权的,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荀子关于“有天下”的含义。

荀子认为,国家权力与世界领导权不同。国家政权可以夺取,但世界领导权是夺不来的,而是自动归属的。他说:“故可以有夺人国,不可以有夺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这是说,有夺取他人统治国家权力的可能,但没有夺取他人世界领导权的可能,有窃取国家权力的可能,但没有窃取世界领导权的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纳粹德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呈上升趋势,其对外军事扩张的成功也扩大了德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然而,

《荀子·正论篇第十八》,第 324—326页。

同上,第 322—323页。

同上,第 323页。

同上,第 326页。

德国并未因此而获得国际领导权,而是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敌人。这一历史经验可帮助我们理解荀子所讲的国家统治权(国)与世界领导权(天下)的区别。

(二) 政治道义为基础的王权

荀子认为,王权是世界上最高的权力,其基础是王权国君主(天子)的道义。他说:“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这是说,以国家的力量实施道义,这个国家很快就会显赫起来,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商汤王和周武王分别依靠方圆不过百里的亳和鄗实现了统一领导,使诸侯国臣服,能到达的地方都接受领导。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实施道义。所以说,道义树立起来就会有王权。现在的梵蒂冈教权就有些像荀子所说的王权。梵蒂冈比新加坡小得多,不但经济实力不如新加坡,而且没有军队,但梵蒂冈在世界事务中的权力却是新加坡无法比拟的。这个例子有助我们理解为何荀子认为道义是获得世界领导权的基础。

荀子认为,拥有王权是实行道义的结果。他说:“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这是说,帝王与他人不同,他的仁爱、道义和威望都是世界最高的。仁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世界上的人都与他亲近;道义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世界上的人都尊崇他;威望是世界上最高的人,世界上的人都不敢与他为敌。有了无敌的威望,加上征服人心的道义,因此能不战而胜,不攻而得,不用出兵就可让世界服从。这才是知晓统领天下道理的人。

荀子认为,王权是以君主个人的高尚道义为基础,因此只有圣人才能可能获得王权。他说:“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这是说,圣人是道义完备、一切完美的人,也是衡量能否拥有天下的标准。我们难以找到符合荀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第 204页。

荀子·王制篇第九》,第 158页。

荀子·正论篇第十八》,第 325页。

子标准的政治领导人,但如果比较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F. D. Roosevelt)和现在的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我们可以观察到荀子所讲的领导人个人道义水平对建立国际规范和改变国际体系的作用。罗斯福的世界和平理念促成了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而小布什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信仰使美国不遵守国际规范,直接导致21世纪初国际防扩散体系的衰败。

(三) 硬实力和战略诚信为基础的霸权

荀子认为,霸权是低于王权的一种国际权力。王权是别国自愿接受的世界领导权,而霸权则是在君主的道义水平尚未达到王者水平时,通过强大实力和战略诚信所获得的国际主导权。王权是自然归属圣人的,但霸权则是君主努力争取才获得的。

荀子认为,霸权虽是低于王权的国际权力,但能获得霸权也是很不容易的。霸主的道义水平虽不及王者高,但至少要具有战略诚信。也就是说,缺少战略诚信的国家,硬实力强大也获得不了霸权。在描述霸权时,荀子说:“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暴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震动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震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这是说,虽然道德不完善,道义不完满,但大体还懂得世界的道理。刑赏和承诺得到了世界的相信,臣民们都知道这些刑赏是可信的。政策出台后,虽发现不利之处,也不失信于百姓;条约签订后,虽发现不利之处,也不失信于盟友。这样就能兵力强大,城池坚固,敌国畏惧;全国上下一致明确,就能得到盟友的信任。即使国家处于偏僻的地方,也能威震世界。五霸就是这样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句践,他们的国家都处于偏僻的地方,但却威震世界,强大到危及中原国家。这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战略诚信。这就是所说的,诚信树立起来就能获得霸权。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第204—205页。

荀子认为,战略诚信仅是霸权的必要条件。只有战略诚信还不足以获得霸权,还需要以硬实力为基础。霸权国君主既需取信盟友又需增强硬实力,这样盟友才会尊其为霸主。荀子描述霸权时说:“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实仓廩,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则诸侯说之矣……故明其不并之行,倍其友敌之道,天下无王霸主,则常胜矣。是知霸道者也。”这是说,称霸的君主不同。他们开荒辟野,充实粮仓,改进兵器,谨慎招兵,招纳有技能的人才。然后以奖赏引导,以严格的奖惩制度纠正错误,使要灭亡的国家保存下来,使已灭亡国家的后裔延续下去,保护弱国,阻止强国,但却无意兼并他国,这样诸侯国们就会与之亲近。采取将敌国变为友邦的策略,以尊敬的态度对待诸侯,诸侯们就会高兴……因此,以行动表明不兼并他国,努力实行变敌为友的策略,当世界没有帝王和霸主时,这样的君主就能经常获胜。这是知道称霸道理的人。

(四) 军事实力与谋略为基础的强权

荀子认为,强权是比霸权还低的一种国际权力,这种权力依赖于军事实力和计谋。军事侵占他国土地是扩大强权的唯一方法,因此强权国必然有很多敌国,这导致强权国容易遭到削弱。荀子说:“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这段论述是说,强权者面临的是别人守城迎战,而我国要用强力战胜对方。这必将大量伤害别国民众,而别国民众受伤害必然憎恨我国。他们越憎恨我国,就越要与我国争斗。这种以强力征服的做法必然会严重伤害我国自己的民众。伤害自己的民众,就会使其憎恨我国。自己的民众越恨我国,就越不愿为我国争斗。别国的民

荀子·王制篇第九》,第 156—157页。

同上,第 154—155页。

众越来越要与我争斗,而我国的民众越来越不愿为我国争斗,这就是强国会变弱的原因。夺来了土地却失去了人民,累赘增加却毫无功劳。要保卫的土地多了,但可用来保卫土地的人却少了,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大了反而实力会下降。

根据荀子的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将这王、霸、强三种国际权力的性质和基础总结为表-2。

表-2 权力性质及其基础

权力性质 权力基础	王权	霸权	强权
道义	强	尚可,有诚信	无
实力	强弱均可	强	强

在分析王、霸、强三种国际权力的基础时,荀子忽视了硬实力对于王权的重要性。即使汤王和武王所据的亳和鄩两地都只有方圆百里,但与同时代的其他诸侯国的地理面积可能更小,实力可能更弱。到了春秋时期,国家的规模普遍扩大了,齐国和秦国一度都曾比楚国还要大,也就是说楚国并不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因此,荀子以楚国地大于汤王和武王也未能获得天下为据,说明实力对王权并不重要的观点缺乏说服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享有很高的国际道德威望,并提出了很有道义的“十四点计划”,倡议建立国联。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使威尔逊政府无法全面参与国际事务,结果美国未能在一战后获得世界领导权。这表明,领导人的道义仅是获取世界领导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没有强大的实力或是不全面参与国际事务,仅有道义的国家也获得不了世界领导权。硬实力对王权和霸权的重要性可能是同等重要的。摩根索注意到,约束人们野蛮争夺的国内道德规范在国际社会上是不生效的,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具有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荀子显然没有意识到国际体系与国内体系性质的区别,因而认为国内社会规范可以完全适用于国际社会。

Hans J. Morga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6th Edi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影印版, pp. 247-249.

四、对国际秩序的认识

荀子有关观念作用的认识与建构主义理论相似,但对国际冲突与稳定的认识则与现实主义理论相似,而他有关防止国际冲突和维持国际秩序稳定的认识则又与制度主义理论有相似性。

(一) 冲突的人性根源

荀子是性恶论者,认为人性本恶,人们为了利益而争夺是自然的社会现象,争夺引发暴力冲突也是必然的。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这是说,现在人的本性是生来就贪利。顺着这种本性,就会发生争夺而不会谦让……因此顺从人的性和情就必然引发争夺,大家都违反等级规范、不讲道理的结果就是暴力冲突。摩根索总结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人性。他说:“政治现实主义相信,总的讲来像社会一样,政治是由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的……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古典哲学的努力发现了这些法则以来,人性就没发生过变化。”

荀子专门写文章解释人性是什么,还批评孟子的人性善说法。他说:“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这是说,孟子说人之所以能学习是因为人性是善的。我说这是不对的,是不懂人性而且是分不清本性与后天行为的区别。所有的本性都是自然生成的,是学不会也做不成的。礼义是由圣人制定的,所以可以学会,而且能够做成。人身上无法学和无法做的东西称为“性”,人身上可以学会和可以做成的是“伪”,这是性和伪的区别。

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第 434—435页。

Hans J. Morga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 4.

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第 435—436页。

荀子认为,人性恶是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无法以物质来满足。他讲:“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这是说,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去追求。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因此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导致混乱,混乱导致贫穷。

(二) 社会规范的抑制作用

荀子认为,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并不能解决人们相互争夺导致的冲突,因此他思考如何避免社会冲突的出发点是抑制人的欲望。他将人的欲望界定为人情感的反应。他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这是说,本性是自然生成的,情感是本性的本质,欲望是情感的反应。基于对欲望的这种认识,荀子认为,通过加强理性,即“心”,就可以抑制反应情感的欲望,从而可以避免社会混乱。他说:“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这是讲,人最大的欲望是生存,最厌恶的是死亡。然而,有的人放弃生而选择死,不是不想活,而是没有办法活下去只好选择死。所以,有欲望而无行动是源于心没有动。如果心是符合理性的,欲望虽多也不会破坏秩序!欲望不高但有行动,这是心中理性驱使的结果。如果心不符合理性,即使欲望少,也制止不了混乱!所以,用心中的理性控制欲望,就可以治理混乱,如让情感支配欲望,混乱则无法治理。

荀子认为,加强人心中理性的方法是建立社会规范(礼)。为此,他专门撰文论述“礼”的内容。他说:“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这是说,礼是治理政治的规范,不按规范处理政治事务,

荀子·礼论篇第十九》,第346页。

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第428页。

同上。

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第492-495页。

就行不通。规范与国家的关系如同秤与重量的关系,如同墨线与曲直的关系。因此,人没有规范就无法成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人,事情没有规范就做不成,国家没有规范就会混乱。荀子认为,相信规范存于人的心中,因此可以通过心中的规范来抑制人性。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这是讲,现在人恶的本性只有在教导和法律的约束下才能被纠正。有了伦理规范,社会才能治理有序。现在的人,无人教导他们法律,行为险恶不轨。没有伦理规范,所以社会混乱无序。

荀子从供需平衡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规范能约束国家行为,避免暴力冲突和维持国际秩序。他认为,规范可以使人们的欲望合理,同时提升人的满足感。也就是说,当人的欲望下降,满足感上升时,两者就容易达到平衡。荀子讲:“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是说,古代帝王憎恨混乱,于是制定规范划分社会等级。用规范来调节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要,使人的欲望不大于物质供给,使物质供给不被欲望所耗尽,两者相互影响,这是规范作用的结果。

荀子关于用规范来防止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思想,与现代制度主义理论有相似之处,即都认为当规范存于人心之中,心中的规范能够控制人对自私利益的追求。基欧汉 (Robert O. Keohane) 和奈 (Joseph S. Nye) 说:“在所有这些用于解决共同问题的制度安排中,国家追求私利的行为受到了抑制,这种抑制反过来影响了所有人的国家利益。”“经过一段时间,政府培养起服从规范的声誉,这并不仅是屈服于法律的明文规定,也是出于精神的意愿。这种声誉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重要财富。”

(三) 社会规范的等级基础

荀子认为,社会规范的两个功能有助于防止国家间的暴力冲突。一是上一

《荀子·性恶篇第二十三》,第 435页。

《荀子·礼论篇第十九》,第 346页。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影印版, p. 294

Ibid., p. 295.

节所讲的调节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平衡；二是确定社会等级，人们按等级规定行为，避免暴力冲突的发生。他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这是说，人生下来不靠群体就无法生存，群体社会没有名分等级就会出现争夺，争夺导致混乱，混乱导致穷困。因此，没有名分等级是人类的大害；有了名分等级是天下的根本利益，君主是管理名分等级的关键。在解释等级规范如何防止社会混乱时，荀子说：“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是说，古代帝王憎恨动乱，因此制定了区分社会等级的规范，于是社会有了贫富贵贱的等级，人们可以相互监督，这是维护天下稳定的根本方法。

荀子认为，没有社会等级抑制人性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欲望，国际暴力冲突就不可避免。他说：“分均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执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这是说，名分相等就没有主从关系，权势相等就无法统一，大家地位相等谁都支使不了谁。有天地就有上下差别，圣明的帝王从治理国家之初就建立等级制度。两人同等尊贵都不会服从对方，两人均卑贱都支配不了对方，这是自然法则。权力地位相等，欲望强烈相同，物质不能满足就必然争夺，争夺的结果必然混乱，混乱的结果必然穷困。

根据西周“五服体系”的历史经验，荀子认为，依据关系的远近建立等级不同的国际规范有助于抑制国际暴力冲突。他认为，周建立的“五服体系”之所

《荀子·富国篇第十》，第179页。

《荀子·王制篇第九》，第152页。

同上。

依据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五服体系”是以周天子的王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一个有中心和边缘的国际体系。王城周围五百里为甸服，种王田为天子提供粮食。向外五百里为侯服，提供劳役和边疆保卫。再向外两千五百里为宾服，宾服的诸侯国为中原国家。宾服地区每五百里为一圻，次序是侯圻、甸圻、男圻、采圻和卫圻，推行文化教育和提供军事支持。再向外的地区有要服和荒服两个地区，每个地区为一千里。要服与荒服与王城的地理距离是相同还是有远近之别不清楚。要服地区按次序分为蛮服和夷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族实行大体相似的政令但可减少赋税。荒服地区按次序分为镇服和蕃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落的制度规范从简，人员可自由迁徙。学者们对“五服体系”的地理范围解释不同，参见叶自成：《春秋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8页。

以能维持西周时期国际体系的稳定,是因为这个体系中不同等级执行不同的规范。他说:“彼王者之制也,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迩而等贡献,岂必齐哉!”这是说,帝王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方法,根据关系远近划分贡献的等级,怎么会都一样呢?联合国成员分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和普通会员国等不同等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按股权多少分配投票权,世界贸易组织按国家发展程度制定标准不同的关税水平。这些事例有助于我们理解荀子为何认为等级差别是国际规范效力的基础。图-4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荀子对人性、社会等级、社会规范和国际秩序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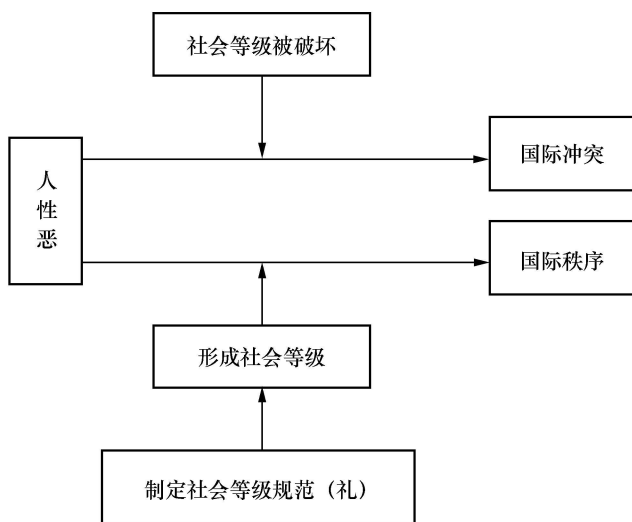


图-4 性恶和社会等级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荀子是这样描述西周“五服体系”等级规范的:“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夫是之谓视形势而制械用,称远近而等贡献,是王者之至也。”这是说,中原各国为天子提供的服务相同,制度礼仪也相同,而那些异族国家虽为天子

《荀子·正论篇第十八》,第 329页。
同上,第 329—330页。

讨论如何调整等级规范以适应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主要原因在于他是内因决定论者,他只考虑了国家的政策如何影响国家实力变化,而没考虑实力对比变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五、荀子思想对中国崛起战略的启示

笔者诠释荀子国际政治思想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介绍古人如何看待国际关系,而更主要的目的是想从中得到对我国崛起战略的启示。

(一) 崛起战略的目标

荀子认为,王权是高于霸权的国际领导权,“天下”是归来的而不是夺来的。这种认识促使我们思考,我国应崛起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一个超级大国既可以是王权国家也可以是霸权国家,两者的性质区别不在于实力大小,而在于道义水平的高低。如果我国要崛起为王权国家,即不同于现在的美国,我国的战略目标就应不仅是实力上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而且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比美国更美好的社会样板。

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我国将成为什么样的超级大国。显然,国际社会不愿中国成为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同时也不希望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如果中国成为另一个美国,其结果有二:不是世界出现两个霸权国家,重现冷战;就是中国取代美国,世界秩序依然不变。两者都不是国际社会所希望的。如果中国成为王权国家,即一个以道义为基础的超级大国,将带给世界比现在更安定的国际秩序。王权体系并非完美的国际体系,但相对于目前的霸权体系而言,王权体系则是一个合作更多和更加和平的体系。

要想成为一个王权性质的超级大国,中国首先要把自己建设成样板式的国家。学界提出的“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其实就是两种社会模式的竞争。只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值得别人模仿的国家,中国就自然能成为王权国家。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财富的增加可以提高中国的实力地位,但不可能使中国成为受到世界尊重的国家,因为一个以财富为最高利益目标的强权超级大国只会给别国带来灾难而不

是福音。2005年9月,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世界的外交政策,强调外交工作以建立友好关系为目标。但是,2006年8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再次提出“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月后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将建设和谐社会确定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历史任务,并且提出社会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这些信息表明,中国政府有意以建立和谐社会取代扩大经济财富为国家的最高政治宗旨,但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形成的强大政治惯性使得中国政府还未能自觉地把建立王权国家作为崛起战略的目标。

(二) 崛起战略的实力基础

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原则,但是战略原则的中心是提高资源性实力还是提高操作性实力(政治实力)仍不够明确。目前,中国最流行的观念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然而,如果以荀子政治实力是硬实力基础的思想思考综合国力问题,我们会发现,1949年以来我国都是政治变革在先,经济发展或军事实力上升在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全新的政治制度,随后的1949—1956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上升。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近30年的历史。2002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政策,国防实力随之迅速提高。反之,政府制定了错误政策后,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都严重衰落。

荀子有关“义”的概念与目前流行的“软实力”概念并不一样。软实力概念没有区分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而荀子“义”的概念是指领导人的观念,是政治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06年8月24日,第1版。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第1—2版。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第1版。

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页。

实力。他将政治实力视为综合国力的根本因素,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如果我们将软实力的构成分为文化实力和政治实力两类,那么政治实力显然是其他实力要素能否发挥作用的基础。例如,2003—2006年间,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实力均持续上升,但因布什政府2003年发动了缺乏国际法理基础的伊拉克战争,使得其国内外的政治动员能力,即政治实力,严重下降。这三年间美国的综合国力显现萎缩状态,国际地位呈下降趋势。这个例子和前面提到的苏联解体的例子都说明政治实力是操作性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实力是资源性实力,没有前者后者就无法发挥作用。据此,我们可以用图-6表示实力要素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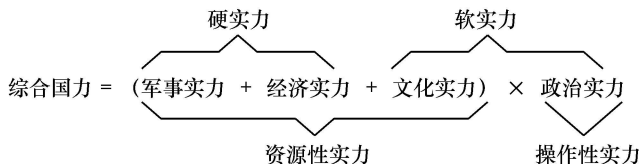


图-6 实力要素概念的关系

以 CP 表示综合国力, M 表示军事实力, E 表示经济实力, C 表示文化实力, P 表示政治实力, 根据图-6 我们可得到一个简化的综合国力公式:

$$CP = (M + E + C) \times P$$

根据上述综合国力的公式, 在目前我国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实力不变的基础上, 只要能较大幅度地提高政治实力, 至少是战略诚信, 我国就能大幅度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以 2006 年中非首脑论坛为例, 我国为非洲国家提供的三年经济援助总量并没有超过欧洲和美国, 但非洲国家对中国援助做出的正面反应远大于对欧美的援助。其原因并非是中国的援助金额比欧美多, 而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 而欧美的援助是以政治条件为前提的。援助的真诚性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外交效果。与此相关的启示是, 中国增强软实力的工作包括政治实力和 cultural 实力两个方面, 但重点应为提高政治实力。

(三) 崛起战略的策略

如果中国崛起战略是以提高政治实力为基础的, 那么现在学界流行的几种

崛起战略就都不适于中国的崛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使物质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这也影响了大国崛起战略的讨论。学界讨论的四种主要战略是改造战略(多极化或对抗)、规避战略(独立自主或孤立主义)、融入战略(搭车或追随)和从众战略(多边合作)。除改造战略外,其他三种战略都是以有利于中国增加经济财富为逻辑基础的。

与物质主义战略不同,荀子主张大国战略是人才崛起战略,即以争取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战略。荀子将国际政治的变化归结为领导人的政治观念,又将选用人才作为国家强大的根本策略。1935年斯大林提出过“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1938年毛泽东也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看法。他们的观念与荀子的思想相似。目前,我国人才战略主要还是用于企业发展的战略,没有上升到国家崛起的层面。人才还被理解为是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而非政治家和高级官员。荀子的人才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才战略不仅是企业发展的战略,更是自古以来关系大国崛起的战略。大国崛起最需要的人才不是科技人员,而是具有制度创新能力的政治家和官员,因为制度创新能力强是大国崛起的根本性因素。

如果在两千年前的农业时代,大国崛起的成败取决于人才,两千年后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也取决于人才,那么我们可以假设现代大国崛起的成败因素仍是人才。荀子认为,人才是指德才兼备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关键在于君主们是否选用他们。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促使大国崛起的人才战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开放程度高,依据能力和品德标准在全球范围内选任官员,增强政府正确决策的能力。例如,古代中国的唐朝和印度半岛的莫卧尔帝国,在崛起过程中都曾大量聘用外国人为官员。据说高峰时期莫卧尔帝国官员中的外国人高达70%。美国获得今日的霸主地位同样是依靠其吸引外国精英的人才制度。二是纠偏速度快,能快速淘汰不合格的政府官员,降低错误决策的比率。所有政治家和官员都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失去正确决策的能力,如贪污腐化、知识过时、思想蜕变、思维能力下降、健康恶化等等。建立及时淘汰官员的制度,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535页。

L. S. Stavrianos, *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London: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NC, 1966), pp. 36-37.

既可为人才提供机会,也可减少决策失误,最终会增强政治实力。

(四) 公平的国际规范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国家主权平等逐渐发展成为普世性的国际规范。荀子的思想与主权平等思想相反,他认为等级不同的规范有助于防止国家间冲突。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崛起后重新恢复东亚的朝贡制度,事实上,任何恢复朝贡制度的做法都必然削弱中国的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然而,大小国家的实力地位客观上是不平等的,建立等级规范有助于保持国家权力和责任的平衡,减少国家间的冲突,增强合作关系。

在现代政治语言中,“等级”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意味着不平等。然而,由于国家实力客观上是不同的,因此只有等级规范才能维持公平,而平等的规范则无法维持公平。拳击比赛按体重分级别就是一种等级规范,有助于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否则,不分体重级别,只以输赢决定冠军的平等规则无法维护公平。根据荀子对“五服体系”的解释,国际规范的差别取决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实力地位越居于世界中心,越要执行严格的国际规范,而对于越是远离世界中心的边缘化国家,越可以执行宽松的国际规范。这就是一种不平等但公平的国际规范。在“10+1”(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中国要先于东盟国家实行农产品零关税。这种不平等的规定使得“10+1”的经济合作得到了较快发展。而日本在与东盟国家进行经济合作时,总是要求在农产品上采取相似的关税水平,结果日本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停滞不前。

历史上的等级规范与平等规范都未能阻止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发生,但如果比较近代国际关系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行等级规范的领域中,国家间的和平状态要优于平等规范的领域。冷战时期,美苏的平等地位使它们为争夺霸权进行了多场代理人战争,而美苏在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内的特殊地位使它们可以防止两个组织的内部成员间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国际安全体系,那么中国提倡什么样的国际规范才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呢?维护全球和平需要实力,只有超级大国才有这种能力。依据荀子等级规范有利于防止冲突的认识,中国应提倡大小国家承担不同的国际安全责任,推行不同国家遵守不同安全规范的制度。例如,在国际维和中,大小国家承担不同的安全责任

并拥有不同的权力;在核不扩散机制中,核国家严格执行不扩散规定,同时也要对无核国家提供核安全保证。

笔者认为,荀子国际政治思想可以归结为他说的一句话,即“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谋权立而亡”。其思想对中国崛起战略启示是,以政治实力为基础,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中国将崛起为世界领导国;平衡发展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可成为世界强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缓慢成为中等发达国家;以政治斗争为纲,将走向衰败。荀子的思想仅是中国古代各种各样国际政治思想中的一派,如果挖掘更多中国先贤的国际政治思想,将有助于我们发展和建设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崛起战略提供指导思想。应当说明的是,荀子思想中也有很多不合理的成分,因此在借鉴时我们先要对其具体观点是否合理做出判断。

《荀子·王霸篇第十一》,第 202页。

作者简介

王荣华 杭州万事利集团投资发展部国际经济政策研究员。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

电子邮件: dhwang_pku@ hotmail com

陈寒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1992年和1995年在陕西师范大学获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东亚的合作安全》(合著,2005年),译著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合译,2003年)。

电子邮箱: chenhanx@mail.gdufs.edu.cn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香港岭南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1995年在烟台大学机械系获工学学士学位,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主要作品有:“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Asia-Pacific China Responds to Global Warming” (co-author), *Global Change, Peace, and Security*, Vol. 17, Iss. 1, 2005 “Knowledge and Climate Change Policy Coordination in China,”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 21, No. 3, 2004

电子信箱: yuhongyuan@hotmail.com

李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2004年在南开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学位,2005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2006—2008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交流学习。

电子邮箱: besonl2005@gmail.com

陈玉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2003年和2006年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chenjudan1981@hotmail.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82年在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著有《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6年)、《国际政治与中国》(2005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2001年)、《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